

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

曹道衡 刘跃进 著

中 华 书 局

责任编辑：张 耕

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丛书

先秦两汉文学史科学

曹道衡 刘跃进 著

※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 61³/16 印张 • 1080 千字

1990 年 0 月第 1 版 1990 年 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0000 册 定价: 2.30 元

ISBN 7—101—04174—4/I • 555

傅璇琮 主编

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丛书

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丛书

总 序

傅璇琮

中华书局古典文学编辑室于几年前即提出编辑《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丛书》的计划,但由于种种原因,这套丛书的起步并不太快。经过几年的准备,穆克宏先生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料述略》,作为这套丛书的第一部,将在今年出版。如何使这套史料研究丛书能加快进行,以适应当前古典文学研究和教学的需要,古典文学编辑室徐俊、顾青两位主任曾几次与我讨论,现经商议,确定由我担任丛书的主编,负责整体构思与组稿。作为中华书局总编,我也有责任把这一不算太小的文化工程承担起来,希望在以后几年内这套丛书能粗具规模。现在已经组约的,有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曹道衡先生的《先秦两汉文学史料》,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马积高先生的《赋体文学史料》,湘潭师院中文系陶敏先生的《隋唐五代文学史料》,还有带有学术史性质的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洪湛侯先生的《诗经学史》,其他尚在陆续联系中。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取得学术界的广泛支持,中华书局的这套书,定将会有不小的规模,在古典文学研究中起到应有的作用。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从整体上说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工程,这里面就有一个对工程整体结构进行了解、分析和设计的问题。八十年代中期,我曾与北京大学中文系倪其心教授及已故的中国社科

院文学所沈玉成研究员就此进行磋商,后即以《古典文学研究的结构问题》为题,撰文在《文学评论》1987年第5期上刊载,表述了我们的看法。我们认为,全面切实探讨古典文学研究的结构,取得整体了解和认识,是进行宏观控制、微观审视的依据。有了整体结构观念便可更真切地了解近几十年来古典文学研究在基础工程和上层结构各方面,有哪些成果和成就,还有哪些薄弱环节和空白领域,哪些方面应当突破和开拓,哪些门类可开辟新分支,等等,从而可以更科学地择定重点项目和课题。

古典文学研究的结构,大体如同建筑工程,可分为基础实施和上层结构两个方面。基础实施是各类专题研究赖以进行的基本条件,具有相对长期稳定的特点。其具体内容,如:(一)古典文学基本资料的整理,包括文学作品总集、历代作家别集的校点、笺注、辑佚、新编。(二)作家、作品基本史料的整理研究,包括撰写作家传记、文学活动编年、作品系年,以及写作本事、流派演变的记述与考证等。(三)基本工具书的编纂,包括古代文学家辞典、文学书录、诗词曲语词辞典、戏曲小说俗语辞典、文学典籍专书辞典或索引、断代文学语言辞典等。

上层结构范围较广,很难全面罗列,就现在想到的,大致有:(一)作家作品的专题研究,文学样式、文学流派的专题研究,以及文学通史、专史的撰著。(二)作品的批评鉴赏,包括古典文学各种方式的普及工作。(三)古典文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如与音乐、美术、建筑、宗教、民俗、服饰以及自然科学的交叉渗透。(四)古典文学比较研究,如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汉民族与兄弟民族文学比较研究,以及古今文学比较、同一主题创作的历史比较。(五)新分支学科的开辟,如充分利用建国以来的考古成果,从文学研究角度从事考古成果的分析研究,开辟一门文学考古学。又如搜集古典作家作品的图录、碑刻、手迹等文物,分析它们在作家创作、作

品传播、文学发展中的作用和价值,以及它们自身的特点,开辟一门古典文学的文物研究。(六)方法论的研究,包括传统的、现代的、一般的及具体方法的研究。(七)学科史研究,包括古典文学研究学术史及古今杰出学者的研究。

从以上并不完全的叙述来看,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应当说内容是十分宏富的。基础实施与上层结构的结合,必更能发扬古典文学的精华,深入探索艺术规律,繁荣学术研究,促进当代创作,为建设精神文明作出自身的贡献。

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主要涉及收集、审查、了解、运用史料问题,因此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上述的基础实施,但应当说它是涵盖以上两方面的内容的。它的触及面可能还要广,举凡与作家作品有关的史书(如正史、别史、杂史等)、地理、各种体裁的笔记、社会民情的记载等等,都应有所述及。而且它还与其他一些学科有所交叉,特别是与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史料检索学等,关系更为密切。古人说,六经皆史。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古代包括经史子集中的典籍,都与文学史料有关。而且文学史料还应包括今人的研究成果,提供新的学术进展线索。我们的史料学研究不能只看古人,更应注视现实,及时反映新的成就。这样做,一方面固然增加研究和撰述的难度,但同时对于应用者来说,则是由此获得仅靠一己的努力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的众多、有效的资料。这将是古典文学研究可持续性发展的基本工程,也是我们这一代学人对于 20 世纪学术的回顾和总结,对于 21 世纪学术的迎候和奉献。

时至 20 世纪 90 年代,各种文学史著作已是一个热点,不断产生。这些著作当各有其特点。我们想,我们这套史料丛书,将是各种体裁、各种观点的文学史著作所不能替代的,不管写怎样的文学史,不管研究哪一时代的作家和作品,不管是教师和学生(包括大学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都将参考这套史料书。我们抱着为研

究者、教学者服务的态度,希望在学术工作中做一点真正有用的实际的工作。

从史料学的建树来说,哲学、历史学已经走在文学的前头。早在1962年,冯友兰先生就出版其所著《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编》(上海人民出版社)。这本书虽不到二十万字,却是建国以来文史哲类史料学的开山之作。书中概述了商周至民国初期的各类哲学史籍,语言明晰,条理清楚,而又评价得中,表现了一位哲学大师高深的学术造诣。嗣后有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三联书店,1982),刘建国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概要》(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历史学方面,有陈高华、陈志超诸位先生的《中国古代史料学》(北京出版社,1983),这是通史性质的。其他还有断代的史料学,如黄永年、贾宪保先生的《唐史史料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冯尔康先生的《清史史料学初稿》(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张宪文先生的《中国现代史史料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另外如谢国桢先生的《史料学概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翦伯赞先生的《史料与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荣孟源先生的《史料与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87),则是通论性的。比较起来,古典文学这方面的成果则较少。我现在看到的只有两种,一是潘树广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史料学》(黄山书社,1992),一是徐有富先生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史史料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这两本都是通论性质的,前者分“史源论”、“检索方法论”、“鉴别方法论”、“文学史料分论”(按文体分)、“编纂方法论”、“现代技术应用论”;后者分“文学史料类型”、“文学史料鉴定”、“文学史料整理”、“文学史料检索”。这样通论性的著述当然是需要的,但我们想,为了使读者具体掌握文学史料,还是按时代、按作家作品系统地论述,较切实用,因此我们拟分两种类型,一种是以时代分(但不拘泥于某一朝代),一种是以文体分。既概括地叙述各种史

料,以史料介绍为主,也可以从学术史角度,论述历代的治学思想和研究实绩(如洪湛侯先生的《诗经学史》),把史料学与学术史结合起来。这将是当代古典文学研究的一种特殊的治学路数。我们相信,这样的一种治学路数必将为 20 世纪中国学术史增添新的内容,树立一种新的标格。

一九九六年六月

目 录

概说	1
一、史料与史学	1
二、先秦两汉的社会状况和文学史料	8
三、先秦两汉文学史料的缮写与流传	27
四、先秦两汉文学史料的特点	33
五、先秦两汉文学史料的分类	37

上 编

第一章 五经与经部典籍	43
第一节 “经”的来源和流传	43
第二节 所谓“经学”及“今古文之争”	60
第三节 《周易》和历代关于《周易》的研究	73
第四节 《尚书》和历代关于《尚书》的研究	88
第五节 “三礼”和历代关于“三礼”的研究	102
第六节 《春秋》、《左传》和《国语》及历代关于它们的研究	119
第七节 《公羊传》、《谷梁传》和历代对它们的研究	137
第八节 《论语》、《孝经》和历代对它们的研究	147
第二章 先秦史籍与神话传说	153
第一节 “经”、“史”和其他典籍	153
第二节 《逸周书》	155
第三节 《竹书纪年》、《汲冢琐语》、《世本》和《春	

秋事语》	162
第四节 《战国策》和《战国纵横家书》	165
第五节 《山海经》	178
第六节 《穆天子传》	183
第三章 先秦诸子研究文献	187
第一节 百家争鸣与先秦诸子	187
第二节 “十家九流”及其来源	191
第三节 《孟子》	196
第四节 《荀子》	206
第五节 《老子》	216
第六节 《庄子》	227
第七节 《文子》和《列子》	238
第八节 《墨子》	246
第九节 《商君书》	251
第十节 《韩非子》	256
第十一节 《管子》	263
第十二节 《晏子春秋》	270
第十三节 《吕氏春秋》	277
第十四节 《尹文子》、《公孙龙子》、《慎子》及《鹖冠子》	284
第十五节 《孙子》及兵家著作	289

中 编

第一章 两汉子书研究文献	301
第一节 陆贾与《新语》	301
第二节 贾谊与《新书》	307
第三节 刘安与《淮南子》	316

第四节	董仲舒与《春秋繁露》·····	319
第五节	桓宽与《盐铁论》·····	324
第六节	王充与《论衡》·····	326
第七节	班固与《白虎通义》·····	329
第八节	桓谭、王符、崔寔、仲长统、荀悦·····	332
第二章	两汉史书研究文献 ·····	344
第一节	《史记》的编撰及历代研究·····	344
第二节	《汉书》的历史功绩·····	357
第三节	从《东观汉记》到范曄《后汉书》·····	362
第四节	有关秦汉文学研究的其他文献·····	372
第三章	秦汉乐府研究文献 ·····	378
第一节	乐府的名称、源流及机构·····	378
第二节	乐府的收集、分类及整理·····	388
第三节	乐府诗研究论著举要·····	394
第四节	乐府诗研究的焦点问题·····	401
第四章	秦汉诗歌研究文献 ·····	414
第一节	秦汉诗歌的著录·····	414
第二节	五言诗的出现及相关问题·····	417
第三节	七言诗的起源·····	439
第四节	历代汉诗研究论著举要·····	451
第五章	秦汉说部研究文献 ·····	455
第一节	小说的涵意·····	456
第二节	《新序》、《说苑》、《列女传》·····	460
第三节	旧题汉人小说的著录和真伪·····	468

下 编

第一章	有关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的重要选本与总集 ·····	487
------------	---------------------------------	-----

第一节	《文选》·····	487
第二节	《玉台新咏》·····	494
第三节	《古文苑》与《古文苑续编》·····	498
第四节	《古诗纪》与《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500
第五节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与《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502
第二章	秦汉石刻简帛文献 ·····	509
第一节	秦代石刻与汉碑的价值·····	509
第二节	秦汉简帛概述·····	512
第三节	汉代画像的意义·····	535
第三章	文字、训诂之学与文学史研究 ·····	542
第一节	文字学、训诂学典籍 ·····	542
第二节	《尔雅》与《小尔雅》·····	547
第三节	《方言》·····	551
第四节	《说文解字》·····	555
第五节	《释名》与《通俗文》·····	560
第六节	《广雅》·····	562
参考文献要目	·····	565
后 记	·····	573

概 说

一、史料与史学

当我们研究历史的时候,不论是通史、断代史或某一学科的专史,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史料的搜集和鉴别问题。这是因为历史学所研究的问题,大抵为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事件,距研究者往往已有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之遥。人们既不可能亲身经历,也很难有所见闻,就不得不借助于典籍的记载。然而要靠典籍去了解千载以上的史事,亦决非易事。因为这些古书由于年代久远,有不少已遭湮灭,即使留存的书往往亦已残缺。所以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就说过“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荀子也说:“文久而灭,节族久而绝”(《非相》)。孔子和荀子上距夏殷尚近,已有文献不足之叹,何况我们生活于二三千年之后,要探讨先秦两汉的史事,困难自然更多。

有关上古的史料所以存者稀少,有种种复杂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当时的物质条件,那时如造纸和印刷术都尚未发明,除了铭刻于龟甲、兽骨和金石上的一部分文字还较易保存外,一般文书均用刀刻写在竹简木牍上或用漆写在竹简或帛一类丝织品上。这些竹帛经过一段时间就会朽腐毁坏。其次是这些古代的文字材料又屡遭人为的毁灭,如《孟子·万章》下记北宫锜问孟子关于周代爵禄

的制度，孟子答云：“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至于秦始皇的焚书，更使先秦典籍遭受了一次浩劫。此后历代的藏书，又多次遭到劫难，如梁末江陵失陷时，元帝萧绎所焚毁书籍有十四万卷之多。《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书，有很多都是梁有而隋亡。所以同书《牛弘传》载，牛弘上书隋文帝。说到从上古至隋书籍已经“五厄”，而隋亡以后隋炀帝在洛阳的藏书于唐初运往长安，途中在砥柱翻船，许多书都漂没于黄河之中。此后又历经兵燹，其损失亦极大。所以不但《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大量典籍均已散佚。即使像雕板技术已发明的宋代，如《崇文总目》等所著录的典籍，遭金兵入侵后亦多有散佚。这种情况对先秦两汉文史的研究来说，影响更大。像我们经常引用的典籍如《世本》、《竹书纪年》等书，均久已散佚。现今所见佚文，皆系后人从各种典籍的引文中辑出。又如盛行于汉代的齐、鲁、韩三家关于《诗经》的解释，亦久已不传于世，清代以来陈寿祺、陈乔枏、魏源、王先谦等人的辑佚，还不免杂有臆测和附会的成分。另外，有些古籍虽散佚而尚有佚文散见他书，有待搜辑；近年出土竹简、帛书与传世诸本的比勘考订，仍有许多工作要展开，而新的发现亦在不断出现。

除了史料的搜集之外，辨伪和存真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在这方面，“五四”以来，曾经有过“疑古”与“信古”之争。当时的争论似乎是“疑古”的论点占了上风，现在看来他们的论点恐怕有许多难于成立，如否定某一史实的存在时，往往使用“默证”，即某书和某书均无记载，则此事就不存在。这种论证方法，难免失之武断，由此而来的是把大量古籍说成“伪书”，而近年考古发现则证明了这些典籍皆先秦古书，并非后人伪托，如《文子》、《晏子春秋》、《鹖冠子》、《六韬》等。应该承认，对上述一些古书的怀疑，并不全始于近代，有的甚至在唐代就有人疑其出于后人伪托，而这种怀疑，亦

可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如果不是定州八角廊和临沂银雀山的发现，的确很难消除。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古代确有一些人为这样或那样的目的而去伪造古籍。例如东晋出现的伪《古文尚书》，自从宋元以来就有人采取怀疑态度，经过清代阎若璩、惠栋等人的详尽考证，其出于伪托早已论定。同样，像《列子》一书，自从马叙伦先生指出它是伪书以来，虽有人提出异议，但通过季羨林等先生的进一步论证，则其出于伪造亦可定案。至于明人所伪造的子贡《诗传》、申培《诗说》以及《晋乘》、《楚梼杌》等之为伪书，亦属不争的事实。因此辨伪和存真的问题，颇为复杂，不能随意对待。例如以前一些学者囿于经学家的门户之见，把《周礼》、《左传》都视为伪书加以怀疑，但近年一些学者通过对金文的研究证实了《周礼》中的记载大多与金文符合，未可轻议。现在随着考古发现证实了不少古书之非伪，又有人转而对过去学者的辨伪工作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恐亦失之偏颇。例如东晋出现的伪《古文尚书》，经阎若璩、惠栋考证之后，其为伪书已无可疑，如果不加分析地当作真实史料来引用，恐怕是不妥当的。即以近年在临沂和定州出土的几部子书而论，虽证明了这些书并非伪书，但从出土的竹简本看来，既非今本的全书，有些与今本还有不少出入，因此对今本的全书一概视为可信，似亦欠审慎。就像我们所常读的《礼记》一书，毕竟是戴德、戴圣杂取其前人著作编成的，过去有的人怀疑其中大部分出于秦汉以后人之手，自然不对。因为郭店楚简和上博楚简中都有着《缙衣》。然而其中是否杂有秦以后人之作，则仍当考虑，因为其《王制》一篇，历来就认为出自汉文帝时博士之手；又如《中庸》之称“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等语，似亦出于秦以后人之手。因此古书的辨伪和存真问题，至今还有许多繁重的工作有待于今后去完成。

鉴别典籍的真伪，这当然是考订史料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具

体到对每一件史事的记载,其可信与否还不完全决定于该书的真伪。这个问题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早已提出过。事实上有些书显然不能说是伪书,但其中有些篇章实无可信,如《战国策》中苏秦以连横说秦惠王之辞,过去的学者已辨其非事实,而自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出土,更证明了此事之根本不可能存在。至于伪托之书,总的来说虽不可信,但其中具体的片段则未必尽伪,因为有些话显然取自《左传》、《礼记》、《墨子》、《孟子》、《吕氏春秋》,还有些则取自汉人文章(如《汉书·路温舒传》所引“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尤其是此书的作伪者当在魏晋时代,所见典籍远较我们为多,除了我们习见的一些话以外,是否还有取自己佚古书中的材料,亦很难判断。其他如《孔丛子》、《孔子家语》甚至今本《竹书纪年》也多少存在这种情况。因此史料之鉴别与考订,应该是史学研究的一个艰巨任务。

关于史料的搜集、整理和鉴别工作的重要性,古代的史学家早有认识,并且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例如汉代的司马迁在撰作《史记》时,就曾“史记石室金匱之书”,掌握了丰富的材料,他又亲自游历全国许多地方,进行实地考察,访问故老,然后开始写作。在写作过程中,他对许多史料又曾作过鉴别。如他在《五帝本纪》中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在《刺客列传》中,他又说:“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这些都说明司马作《史记》时,对史料的鉴别颇为审慎。即使如此,后来清代的梁玉绳作《史记志疑》,仍然指出了书中许多失实之处(当然,梁书也有一些吹毛求疵的地方)。宋代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而吴缜作《新唐书纠谬》,专纠其失;司马光等人撰《资治通鉴》,附有《考异》,对史料作过较仔细的考订,但后人指出书中的

失误亦复不少。可见史料的鉴别工作实不可忽视。在这方面，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作《史通》，特设了《采撰》一篇，专论广泛地搜集史料的必要性。他说：

盖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

他虽然主张博采，但更强调要有鉴别：

其失之者，则有苟出异端，虚益新事，至如禹生启石，伊产空桑，海客乘槎以登汉，姮娥窃药以奔月。如斯踳驳，不可殚论，固难以污南董之片简，沾班华之寸札。

他不光对那些荒诞不经的神话传说提出了质疑，甚至对当时人深信不疑的说法也提出了不同看法。如《疑古》中，他对《尚书·尧典》序中所谓尧舜禅让之说表示怀疑，而对《汲冢琐语》及《竹书纪年》所说“舜放尧于平阳”，“益为启所诛”等记载认为未必不可信，这种想法虽至今有争议，但在当时不失为大胆的识见；在《暗惑》中，他又根据汉代州牧出行时“前驱竞野，后乘塞路，鼓吹沸喧，旌旗填咽”的情况，说明《东观汉记》载郭伋出行，“有儿童数百，各骑竹马，于道次拜迎”等待之事不可信（按：此事亦见范曄《后汉书·郭伋传》）。这些都说明其史识之高。后来宋代的洪迈、王应麟直到清初的顾炎武等人，都曾对许多史事作过卓有见地的考证。至于清代的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更对历代正史的许多内容进行详密的考证，说明我国古代的史料学已具有悠久的传统。近代以来，更由于考古的发现和国外先进的社会学说及思维方法的输入，使史料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应该说，20 世纪我国的史学是取得了很大成绩的。

当然，近代以来史学在取得进展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缺陷。曾经有一个时期，有人仅仅强调了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订，而忽